

中 华 文 史 新 刊

《毛诗正义》研究

——以诗学为中心



杨金花
著

书稿从阐释学的角度，探讨了《毛诗正义》中以文学方法解诗的现象，分析了这样解诗的原因和目的，并对这种解诗方法的影响和意义进行了考察和评述。认为这种方法无论是在经学史上，还是在文学史上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：在经学史上，它使得经学的解说更合情理，并为经学服务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可能，从而巩固了经学的地位；在文学史上，它客观地促进了《诗经》文学价值的开掘。

中华书局

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
河北大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
资助出版



中 华 文 史 新 刊

《毛诗正义》研究

——以诗学为中心

杨金花 著

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毛诗正义》研究:以诗学为中心 / 杨金花著. —北京:
中华书局, 2009.8
(中华文史新刊)
ISBN 978 - 7 - 101- 06800 - 9
I .毛… II .杨… III .毛诗正义—文学研究 IV . I207.22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(2009)第 081329 号

书 名 《毛诗正义》研究——以诗学为中心

著 者 杨金花

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

责任编辑 罗华彤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版 次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 /630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
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- 06800 - 9

定 价 26.00 元

目 录

序	詹福瑞 1
引 言	1
第一章 以文学手法解诗	13
第一节 释字句篇章,依韵解诗	13
第二节 以文逆意,以文势解诗	30
第三节 比兴解诗	46
第二章 以文学手法解诗的原因和目的	63
第一节 情志一也:从本体论的角度疏通了文学与经学	63
第二节 讴歌与今诗:从发生学的角度疏通了文学与经学	79
第三节 以文学手法解诗的目的	92
第三章 《毛诗正义》诗学观评价	113
第一节 以文学手法解诗对后世的影响	113
第二节 以文学手法解诗的意义	128
参考资料	142
后 记	147

序

詹福瑞

杨金花和韩田鹿夫妻两人都是我的学生，二人考上同一个导师，这在学界不多见。但是他们夫妻只能说是我的半个研究生，又是学生中的特例。我原来所在的河北大学古代文学博士点，以汉魏至唐宋一段师资力量最强，而明清一段较弱，尤其是小说，所以这一段原来没有博士生导师。为了加强这一部分的师资力量，我在2002年特例招明清文学博士研究生。田鹿报名并考取。然后我把他送到南开大学陈洪先生那里，拜陈洪为师，学习中国古代小说。田鹿出自书香门第，父亲韩进廉先生是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名家，耳濡目染，加之天资聪颖，是个读书的好种子。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出一套古代小说读物，国星兄为之物色作家，我推荐了田鹿，写《漫说聊斋》，稿子得到了国星和古编室主任绚隆的好评。田鹿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毕业论文。此后，或数月，或半年，就会有田鹿信息来，都是古人有关道德文章的名言，我也就知道他在读什么书。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以来，手机段子成了朋友间交流最时尚的形式。段子不出两部分内容，针砭时弊的称为黑段子，带些颜色的是黄段子。中国人的诙谐、风趣、智慧以及灰暗、无聊都在段子中充分发挥出来。据说有两位名士聊天：一人说：一代有一代文学，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，到了当代，什么可称代表性的文学呢？另一位名士郑重说：段子呗。田鹿的信息却于此滔滔天下无不段子中，发表古人的“陈词滥调”，就显得那么的阳春白雪，也那么的另类。而对我来说，就感觉好似在浩浩荡荡的奥迪结婚车队里冒出的骑着毛驴的新娘，在陈旧中透出清新。呵呵，真是很好的先进性教育啊！在河北大学中文系中，有二三子，我与他们只谈读书，不涉名利，除了武铃之外，就是田鹿，应该是河北大学的稀世之物。

金花是我和金善合带的博士生，说好了分给金善，我不带了。但是金善却非得要我挂个导师的名。而我一旦挂了这个名，就不自觉地

认真起来,于是也就真当了半个导师。金花是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,毕业后留在河北大学出版社做编辑。我在河北大学任副校长时兼任出版社社长,后来辞了社长,却又在班子里分管出版社工作。按照一般人想法,我在出版社工作多年,自然会从中渔利。其实清者自清,浊者自浊。真正的得利就是实实在在接触了一些人,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等,胜读了十年书本。金花也自然在我能够深入认识的人里面。她有田鹿的颖悟,却无田鹿的迂阔。做事扎实干练,做编辑细致认真。在我看来既学问扎实,又有干练之才。平时接触不多,却心有戚戚焉。金花读博士时,因为我在北京,她多是与金善学习,来京也是行色匆匆。但是谈话之中,许多事情,一点就透。因为硕士阶段学的是古代汉语,长于训诂文字之学,所以扬长避短,和她商量,研究孔颖达等人的《毛诗正义》,从繁琐而又零碎的注释中,总结其文学思想。

研究这一题目,除了金花的个人原因,也有学术研究的特别需要和我个人的考虑。《诗经》自然是文学文本,但是自先秦以来,就并未把它视为文学作品。尤其是汉代之后,作为经书之一,人们对它的注释与解说,都未脱经书的视野。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易教上》说:“六经皆史也,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,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,经纬世宙之迹,而非托于空言也。”六经皆史,概莫能外,《诗》也是史,这就难怪汉代经师讲《诗》,都要附会以《诗》的本事,附会以微言大义。我在《中古文学理论范畴》一书中,考察“诗言志”这一命题时,曾经分析过《诗序》首句言志、次句以下附会以史的现象,并且分析过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,章学诚的话基本可以概括经学家对《诗经》的认识。但是,由于《诗经》的文本就是文学,所以无论先秦还是两汉在注解《诗经》过程中,都或多或少不自觉地向文学回归。汉代说《诗》,对“吟咏情性”本质属性的揭示,就非常有代表性。它不仅认识到诗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的创作动因和心理过程,而且还认识到了诗以情感人的特点。这就由经学解《诗》的范畴进入到了文学的范畴。然而这样的认识毕竟不是自觉的,因此在具体注解《诗经》篇什时仍旧恪守六经皆史、诗以言教的路数。经学发展到宋代,发生了重大变化,表现在《诗经》的注解中,就有了对《诗序》的怀疑和对所谓淫诗的确证。从经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,其实是对经就是史的固有观念的怀疑,对于《诗》的神圣性的怀疑甚至颠覆。而从文学的角度审视这一事件,我们看到的是《诗经》文学性的逐渐由隐至显,其正当性得到了确认。这些又都体现在对《诗经》具体作品的解读中。宋代经学的巨大变化并非偶然,有宋

代自身的原因,同时也有经学发展的自身原因。还有,就是文学经过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的发展,逐渐深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,对经学生成的影响。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主持编写的《毛诗正义》,是国学使用的经学教材,对有唐一代士人的影响甚大。它在《诗经》解读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,尤其是在文学的性质由隐到显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,就尤其值得关注和认真研究。

这个题目固然是一个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的研究题目,但是做起来却不很容易,难就难在如何切入考察,寻找到一条从经学进入文学的通道;难就难在从经学家繁琐的注疏中辨析文学性解读的蛛丝马迹。

金花的论文应该说为破解这些难题做出了努力,而且也有很大的收获。她的论文最重要的收获(而且对我们研究经书与文学的关系颇有启示),就是基于《诗经》同是经学和文学文本的共通性的认识,借鉴韦勒克、沃伦的《文学原理》,找到了从文学角度进入经学的解读方法:“形式层面,包括诗的外在结构——语句、篇章和内在结构——节奏韵律,看它们是如何构成诗的;意义层面,分析每首诗想要表达什么;方法层面,通过对诗歌表现手法的探讨,说明诗是如何达意的。”在形式的层面,“文”“辞”只是构成意义的“材料”,本身不具有文学或经学的属性。然而经学家解读《诗经》的意义,又离不开对这些“材料”的分析,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属于文章学的范畴。这样,考察经学家对“文”“辞”的分析,就是从寻找经学通向文学解读的一种途径。

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途径。从汉代到唐代这一段历史时期,正是文章之学十分发达的时期,关于文体的认识空前深入,关于文章的写作也得到了广泛的探讨。著名的《文心雕龙》就是代表。因此唐代经学家们注释《诗经》时的学术背景,已经不是简单的经学的背景,还有魏晋南北朝高度发达的文章之学的背景。事实上,《毛诗正义》分析诗篇,正是受了文章学的影响,从篇、章、字、句、韵入手,来讲“言”是如何“抒情适变”的。“章有数句,句字多少不同,皆由各言其情,故体无恒式也。”“诗之大体,必须依韵。”这明显是从诗的特性来讨论《诗经》了。所以在具体注释诗的时候,孔颖达们就能突破旧说的局限。如《诗经》有的诗句次序的先后,郑注毛传都是从礼从制度着眼来理解,而孔颖达们就看到了有的仅仅是为了押韵,是“便文”和“协句”。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,在讨论诗的字数问题时,《毛诗正义》引进了挚虞的《文章流别志论》及颜延之关于九言诗的讨论,证明在涉及

诗的形式问题时,《毛诗正义》确已突破了章句之学的局限,引入了文章学,接近于文学的解诗了。在论文中,金花以其女性的细腻和文字学的实证精神,一篇一篇分析孔颖达们注解诗篇时是如何注意到了韵的手法,是如何以互文、对文,以比兴来解诗的。在孔颖达们注解《诗经》所涉及到的这些艺术手法中,除了比兴学界多有论述外,其他的则很少有人关注,较少论及。不仅如此,金花在讨论《毛诗正义》这些问题时,还为我们清晰地辨析了《毛诗正义》的章句与一般章句的不同。而且认真研究孔颖达们在注疏中关于篇章字句的认识,探讨《毛诗正义》的章句之说与《文心雕龙·章句》及魏晋南北朝文体论的渊源关系,从而指出,孔颖达的章句之说是受了《文心雕龙》和魏晋南北朝文体论的影响。金花的论文令人信服地证明,孔颖达们确已比较自觉地从诗的艺术形式入手解释《诗经》了。

而在意义的理解层面,金花的论文紧紧抓住了毛诗正义“假言”“假说”“设辞”这样一些词语,以揭示《毛诗正义》在解诗时对于其文学特点的认识,可谓抓住了关键。所谓的“设辞”和“假言”,就是认识到了诗的虚构特点。《卫风·有狐》中“之子无裳”句,孔疏:“裳之配衣,犹女之配男,故假言之子无裳,己欲与为作裳,以喻己欲与之室家。”《郑风·有女同车》,小序以为讽刺太子忽不与齐侯之女结婚。孔疏:“此忽实不同车,假言同车以刺之。”虽然在疏不破注的原则下,孔疏对诗即是史的传统仍不敢有大的突破,只在一些细节上讲诗的虚构,但是这样的一点改变不可小视,其实是开了宋代《诗经》学怀疑旧注和朱熹主张“宽说”《诗经》的先河,对经学观念有着重要突破意义。金花可谓为我们找到了以文论诗的草蛇灰线。

孔颖达们理解《诗经》文意,常常讲“文势”。此“文势”对于了解孔颖达们是从何种角度来分析《诗经》的,也有重要的意义。金花的论文对此用了相当篇幅加以讨论。何谓“文势”?与之相关的“势”与“义势”是什么意思?孔颖达如何用“文势”释诗的?都有十分精彩的论述。“文势”是什么呢?对于写诗而言,就是写作的方法,孔疏《大雅·行苇》“舍矢既均,序宾以贤”句云:“以意在可知,故不设此言,是作文之常势也。”明明白白讲起了作文的方法。金花引了《周南·葛覃》《小雅·瞻彼洛矣》的孔疏,得出“文势”就是写作方法的结论,是符合实际的,也是对于《毛诗正义》引入文章学论诗的有力证明。而对于理解诗而言,“文势”就是上下文的语境,既有字词修辞的语境,也有事情情境的语境。如“肃肃”,在《兔置》中,以诗句“美其贤人众多”,

释为“敬”；《小星》中以其释“宵征”，释为“疾貌”；《鸛羽》和《鴻雁》说鸟飞，释为“羽声”，释义不同，是“各随文势也”，就是字词的语境不同。《大明》“摯仲氏任”，孔疏“以文势累之，任，姓；仲，字；故知摯为国也”。也是以字词的语境训“摯”之义的。而《楚茨》“以为酒食，以享以祀”一诗，孔疏说：“而此文势，得用税物者，亲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劝民耳，非必祭祀所用皆所亲为。”则是根据事情的情境所作的解释。如此等等，从金花论文所做的细致分析，可以了解到，孔疏的特点之一，就是根据上下文的语境来理解文意。通过金花的分析，我们还进一步认识到，孔疏以“文势”说诗，是认识到了诗作为文章之一的特殊性。以“文势”说诗，诚如金花所判断的，就是“从文章写作的角度进行的解释”。换句话说，虽然在内容的解说方面《毛诗正义》并无多少重要的突破，但是在对待诗的态度上以及解诗的方法、途径方面，孔颖达们超过了汉人，已经朝着文学的解读迈进了一大步。

时下评价博士论文，动辄就是填补空白之类。我近些年辅导学生作博士论文，不太追求什么填补空白，也不回避别人做过的题目。填补空白能有多少意义？很难说。填补空白和学术意义及学术水平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。所以我只要求学生认真读文本，从细读和深思中找到自己的体会和认识，从深细中树新见和学术水平。金花的论文也许就是我这种思想的产物。当然，人之治学各有所长，也各有所短。从大量的繁琐的注疏中爬梳出《毛诗正义》的文学解读，是此论文的长处；但是因为金花不是学文学理论的出身，不会发挥阐释之长，洋洋洒洒，左右逢源，头头是道，有一分材料就能生发出诸多想法，就能写出令人羡慕的大部头。所以她的论文一旦阐述起理论来就显得捉襟见肘，不那么充盈饱满，奉献给读者的也只能是此薄薄的一本。当然，论文的学术分量不会因书的厚薄而定轻重。而这也只能让读者去评说了。

2009年6月16日于国家图书馆

引言

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,《诗经》既是文学经典,也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。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,它一直被尊称为“经”,历代统治者都将其作为重要的政治参考文献加以推崇。地位如此特殊,也就无怪历代对其进行诠释的著作汗牛充栋,史不绝书了。

在浩如烟海的《诗经》诠释著作中,孔颖达主持编撰的《毛诗正义》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。作为奉唐太宗之命编写的《五经正义》之一,它从经学立场出发,对《诗经》进行了疏解。成书后,被当做国学的教材和明经科考试的标准书目之一在全国使用。

一

汉武帝即位以后,出于使汉家政权“传之亡穷,而施之罔极”的目的和“永惟万事之统,忧惧有阙”的忧虑,曾多次下诏向“明先圣之业,习俗化之变,终始之序”的董仲舒策问有关“天命与情性”的问题,董仲舒则“谨案《春秋》之中,视前世已行之事,以观天人相与之际”进行了回答。董仲舒认为,前世圣王之所以能长治久安,主要是实行德政和推行礼乐教化,并进而指出,“治乱废兴在于己,非天降命不可得反,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”。董仲舒通过多方论证,认为“《春秋》大一统者,天地之常经,古今之通谊也”,建议实行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,“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,皆绝其道,勿使并进”^①。从此儒学取得独尊的地位,作为儒家经典的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五部著作也被称为“经”,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。

^①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。

经学在两汉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,人们大多习惯于以经书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。到了东汉末年,经学因其繁琐的章句,以及与谶纬的结合,逐渐遭到人们的厌弃。汉末的大动乱更是加速了经学的衰落,这时最为统治者需要的是具有各种实际才能、思想活跃的人才,包括擅长写作的文章之士。

经过汉末的大动乱,魏晋时期的人们看到,被朝廷定为思想至尊的儒学并不能保障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定。这一事实促使士人开始进行新的思考和探索,于是有的放弃了儒学,转向谈玄的名理;有的开始反思,对儒学进行重新探讨。

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,此时儒学虽然不再享有独尊的地位,但就官方来说,其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仍然占有重要地位,历代统治者一旦稍稍安定下来,就提倡儒学即是明证,而士人对经学的研究也并未中断。从现存史料看,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《诗经》的著述远远超过了其前的汉代和之后的隋唐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《诗经》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,一是魏晋时期,一是南北朝时期。魏晋时期《诗经》的研究特点主要是古今文经学之争,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毛诗正义”条云:“自郑笺既行,齐、鲁、韩三家遂废。然笺与传义亦时有异同,魏王肃作《毛诗注》《毛诗义驳》《毛诗奏事》《毛诗问难》诸书,以申毛难郑。……王基又作《毛诗驳》,以申郑难王……晋孙毓作《毛诗异同评》复申王说。陈统作《难孙氏毛诗评》,又明郑义。祖分左右,垂数百年。”^①形成王学郑学之争。这些争论,表面看起来是今古文经学的争论,但实际上从郑玄融通今古文经学给《毛传》作笺,打破今古文经学的樊篱后,各家其实主要是借评论、批驳他说来陈述自己的看法。此时的经学研究还有一个倾向,就是淡化了功利性,经学的研究被视为个人的修养和成就,如张昭和杜预等高官,往往是“在里宅无事”^②,“从容无事”^③,进行经学的著述,在此风气下,《诗经》研究因注重文本而更加接近人情。南北朝时期的经学研究主要是南学北学之争,最后南学战胜了北学。受玄学思辨和佛学重视以义疏解经的影响,此时的《诗经》研究更加重视文本和义理的阐释,这从当时著述的书名就可看出。总体来看,魏晋南北朝时期的《诗经》研究在坚守《诗》的政治教

①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中华书局1965年版。

②《三国志·吴志》卷七。

③《晋书》卷三十四。

化意义的前提下,力求更加通达情理,它昭示了一种新的解经思路。

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的繁荣,促使人们开始自觉地探讨作文(文章写作)的规律,如陆机在《文赋》序中曰:“故作《文赋》,以述先士之盛藻,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,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。”^①刘勰也在《序志》篇中明确说明自己写作《文心雕龙》的目的之一,就是探讨如何写作:“夫文心者,言为文之用心也。”^②五经作为文化的源头,作为儒家的经典,自然被转化为各种文章的源头重新进入士人的视野,而作为文学创作源头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的《诗经》,更是被作为文章写作的经典,成为当时研究的重点:如颜延之在《庭诰》中曰:“观书贵要,观要贵博,博而知要,万流可一。咏歌之书,取其连类合章,比物集句,采风谣以达民志,《诗》为之祖。”^③认为咏歌之书,以《诗经》为祖,包含了以儒家经典为文章本源的观点。陆机在《文赋》中说:“倾群言之沥液,漱六艺之芳润。”也表明儒家的经典被当时人从文章写作、语言运用的角度加以研究,而不仅仅是被当做修身治国的教材。颜之推在《颜氏家训·文章》中曰:“夫文章者,原出五经。诏命册檄,生于《书》者也;序述论议,生于《易》者也;歌咏赋颂,生于《诗》者也;祭祀哀诔,生于《礼》者也;书奏箴铭,生于《春秋》者也。”^④——指出各种文体与五经的渊源,既表现了对儒家经典的尊崇,也表现了对文章的重视,同时还表明人们开始从文章写作的角度来看待五经。

与汉人相比,魏晋南北朝人不再把文章写作当成雕虫小技,对文章的价值有了重新认识。曹丕首开其风:“盖文章,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”^⑤把文章的价值提高到了与建功立业相并列的地位。在认识到“年寿有时而尽,荣乐止乎其身,二者必至之常期,未若文章之无穷”后,甚至把文章的价值提高到比立德、立功还高的地步,成为延续生命的一种方式。对文章作用的认识方面,在申说前人采诗观风和圣人经典载体等观点的基础上,强调其自身的功能:文章可以泄导人情,如钟嵘在《诗品序》中云:“凡斯种种,感荡心灵,非陈诗何以展其义?

①《六臣注文选》卷十七,上海书店1989年版。

②周振甫《文心雕龙今译》,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本文有关《文心雕龙》的引文,如无特殊说明,均出自该书。

③张溥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。

④《颜氏家训》,中华书局1985年版。

⑤《典论·论文》,《六臣注文选》卷五十二,上海书店1989年版。

非长歌何以释其情？”^①诗可以抒发人心中的各种情感，释放胸中的多种情绪。强调诗的抒情性特征，陆机更是响亮地提出“诗缘情而绮靡”，指出诗歌是因情而作。认为情感是诗歌的根本：“夫诗虽以情志为本，而以成声为节。”^②此外还从起源与创作动机、本质与特征、文体与创作手法等多个方面对《诗经》进行了探讨，在探讨中更加重视个人的理解和体会。

在文学创作实践中，人们开始引用和化用《诗经》中的诗句，典型的也是人们经常提及的，如曹操的《短歌行》：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”前两句出自《郑风·子衿》，后四句出自《小雅·鹿鸣》。此外，还对部分诗旨加以文学的提炼，对其中的佳句从文学的角度进行鉴赏，如曹操在《苦寒行》中曰：“悲彼《东山》诗，悠悠使我哀。”感伤时乱，抒发了对征人的理解和同情。曹丕在《与吴质书》中则云：“三年不见，《东山》犹叹其远，况乃过之，思何可支？”借《东山》诗表达了对朋友的思念之情。虽然曹操、曹丕父子引诗的目的不同，但他们都结合自身的体会，感悟到了征人的痛苦，不同于小序提炼的诗旨：“《东山》，周公东征也。周公东征，三年而归，劳归士，大夫美之，故作是诗也。”佳句品赏的例子，如《颜氏家训·文章》：“王籍《入若耶溪》诗云：‘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’江南以为文外断绝，物无异议。简文吟咏，不能忘之；孝元讽咏，以为不可复得……《诗》云：‘萧萧马鸣，悠悠旆旌。’《毛传》云：‘言不喧哗也。’吾每叹此解有情致。籍诗生于此意耳。”^③认为《小雅·车攻》中的这两句诗具有以动致静的意韵和效果。

正是在上述背景下，《诗经》的经学研究也日益注重从经文本身出发，更加注重情理，如《邶风·击鼓》，小序认为这首诗的题旨为：“怨州吁也。卫州吁用兵暴乱，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，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。”其中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句下郑玄笺曰：“从军之士与其伍约，死也生也，相与处勤苦之中，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，志在相存救也。……执其手，与之约誓示信也。言俱老者，庶几俱免于难。”认为这是处在战争苦难中的士兵与其同伴迫不得已发出的自救誓言，表达了对州吁的不满。王肃对此句的解释虽然仍在小

①《梁书·钟嵘传》。

②挚虞《文章流别论》，张溥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。

③《颜氏家训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。